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4.2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社會學作為志業

Dorothy Smith,
Herbert Gans

社會學和政治之間

An Interview with
Nicolás Lynch

烏克蘭動盪

Volodymir Paniotto,
Volodymir Ishchenko

氣候變遷

Yuan Tseh Lee and
Andrew Wei-Chih Yang,
Herbert Docena

中國真正的革命

Feizhou Zhou,
Yonghong Zhang,
Ying Xing

- > 權力的殖民性
- > Chiapas: 面對不平等
- > 敘利亞監獄
- > 伊朗女性的命運
- > Jan Szczepański: 搭起橋樑
- > 波蘭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
- > 波蘭學生的公開信
- > 土耳其團隊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2期 / 2014/06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面對不平等

這是即將在 7 月 舉行的橫濱世界大會之前最新一期的全球對話，而預期大會人數將會有 5500 人。大會主題：面對不平等的世界，是本世紀最重要的議題。即使經濟學家也都湧進這個社會學曾經主導的領域了，最好的例子就是 Thomas Piketty 的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這期全球對話也處理了這個議題。李遠哲和楊為植告訴了我們不同領域其使對於全球暖化有相同的關信，這點也被 Herbert Docena 所強調。他報告了聯合過氣候變遷會議的結論，而美國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方式強迫推銷給其他國家。其他國家雖然不同意，但是力量分散且不夠強大。我們在殖民性的概念中看到這個現象。César Germana 認為這是全世界重多不平等的根源。我們的確在 Volodymyr Ishchenko 和 Volodymyr Paniotto 的烏克蘭文章中看到了冷戰的復甦讓烏克蘭反統治階級的運動陷入了分裂的危機。

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並沒有比國內的不平等來的嚴重惡化，特別是在半邊陲的國家，像是印度和中國。為什麼？中國社會學家周飛舟、應星、張永宏敘述了上海、北京之外的城市的景象，是如何從農村轉變成為都市，如何剝削了農民和工人，以及如何炒作土地，讓新興的精英階級得利。我們看到了農民並沒有買單，但是也很難有成功的抵抗。

「麵包、自由、正義」的口號遍佈在 3 年前埃及推翻了 Mubarak 獨裁政權時後，而在民主實驗之後，他們又再一次面對了軍事統治的政權。阿拉伯之春的理想在其他地方也黯淡了，像是敘利亞的內戰，難民大量湧入旦、黎巴嫩、土耳其。Abdulhay Sayed 告訴了我們鮮為人知的監獄刑求內幕。另外還有伊朗社會學家 Shirin Ahmad-Nia 所描述的伊朗在 1979 年革命後的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

同時，東歐仍然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現在已經滲透到高等教育了，公共社會學實驗室討論了這個現象和可能後果。他們也描述了 ISA 前會長 Jan **Szczepański** (1966-1970) 的理念：「人性的社會主義」。



Dorothy Smith, 女性主義者，敘述她怎麼認識女性主義以及如何發展出特殊的方法：制度民族誌。



Herbert Gans
美國社會學家，敘說他對未來公共社會學的願景。



Nicolás Lynch
秘魯社會學家和政治人物，敘述他一生在左派政治和學術之間徘徊的故事。

全球對話以 14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Ritu Saraswat,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Faezeh Esmaeil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Shuhei Naka, Kiwako Kase,
Misa Omori, Kazuhiro Kezuka.

波蘭:

Krzysztof Gubański,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la,
Kamil Lipiń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Mikołaj Mierzejewski, Adam Müller,
Przemysław Marcowski,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Konrad Siemaszko.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Ioana Cărtărescu,
Miriam Cihodariu, Daniela Gaba, Mihai Bogdan Marian,
Mădălin Răpan, Alina Stan, Elena Tudor.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Yonca Odaş, Günnur Ertong, İlker Ural
and Zeynep Tekin.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面對不平等世界 2

社會學作為志業：制度民族誌的系譜
by Dorothy E. Smith, 加拿大 4

社會學作為志業：期待未來
by Herbert Gans, 美國 6

> 拉丁美洲

社會學和政治之間
An Interview with Nicolás Lynch, 秘魯 8

權力的殖民性
by César Germana, 秘魯 11

Chiapas: 面對不平等
by Markus S. Schulz, 美國 14

> 中東

敘利亞監獄
by Abdulhay Sayed, 敘利亞 17

伊朗女權的進步？
by Shirin Ahmad-Nia, 伊朗 19

> 烏克蘭反叛

Euromaidan反叛運動
by Volodymyr Paniotto, 烏克蘭 21

革命尚未開始
by Volodymyr Ishchenko, 烏克蘭 24

> 氣候變遷

改變人類發展
by 李遠哲、楊為植, 台灣 26

市場主宰人類的命運
by Herbert Docena, 菲律賓 28

> 中國的變與不變

中國都市化的變遷
by 周飛舟, 中國 32

土地掠奪和貪腐
by 張永宏, 中國 34

疏濬抗議
by 應星, 中國 36

> 波蘭

Jan Szczepański – 建造危險的橋
by Adam Müller,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rzysztof Gubański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蘭 38

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
by Dariusz Jemielniak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蘭 40

高等教育改革公開信
from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the Critical Section,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Cracow, 波蘭 42

土耳其團隊 44



> 制度民族誌的系譜

by Dorothy E. Smit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Dorothy Smith.

我想寫作關於社會學作為志業，對我來說並不容易。特別是要說說關於我什麼時候開始感興趣，讓我獻身努力於這個領域的。我是意外地成為社會學家的，這是一連串的依賴過程：第一，我個人歷史的意外，第二，兩個我所投入運動的意外，這轉變了我。

意外：我 1952 到了 LSE，因為我對行政工作一點興趣也沒有，想說若有一個大學學位，那我應該會找到比較有趣的工作吧。於是我在那得到了社會科學的學士，然後遇到了我的先生 Bill Smith，結了婚，後來到了 Berkeley 念社會學博士。我之前就主修社會人類學。

Dorothy Smith 是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的先驅，其「制度民族誌」把日常生活放到更廣的賣絡中，特別是「統治的關係」。她是許多「給女性的社會學」著作的作者：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1987),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90), 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2005)。她也得過很多榮譽，像是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現在是 ISA 的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G06) 成員。

Berkeley 是一個非常新的經驗。在 LSE 沒有什麼社會學。而我們念涂爾幹、馬克思、韋伯等其他，我們學人口學，關於種族的基因理論，社會哲學、倫理等等。我們討論且激辯。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和啟發，Berkeley 的社會學讓我學到很多，特別是在那個 McCarthy 時代。

回顧來說我可以看到在我唸研究所的時候，也就是 1955-1963，社會學是一個專業的領域，而且和之前的複雜政治脈落變得不相關。這樣一來和芝加哥學派的傳統連結變弱了，Berkeley 的社會學和其他地方的社會學也都繼續去政治化，只在 C. Wright Mills 的作品中找到

>>

政治批判的影子。那時 Parsons 的社會行動的結構非常有影響力，馬克思乏人問津。社會學在那個年代的重新建立包括了概念的重新塑造：例如，社會階層化的概念比階級要來的普遍，而因為商業的重要性，組織的理性這種空洞的概念也被發展出來，很顯然也是特別為了讓管理學接收而來的。

意外：Bill 是我先生，他在 1963 年某天早晨離開了我們。我們有兩個小孩，一個只有 9 個月大。我開始要承擔責任賺錢，而且我必須發表，我喜歡做研究和寫作，可是沒想過發表。於是我開始讓我自己專業化。

在 1981 時我找到了工作是在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我的大兒子 8 歲，和我一起要在多個選擇之中做出了這個決定（那時大學擴張中），因為當我們看著 Vancouver 的地圖的時候發現該大學在很北邊，而且沒什麼道路。

意外：2 年後我深受加拿大本土化運動所影響，這個運動一開始是在文學和歷史領域，而後來社會學也開始趕上了。那時候我發現我在 Berkeley 的訓練好像是在羅馬帝國一樣，要把羅馬的秩序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我教的社會學和我所處的社會一點關係也沒有。

現在我剛成為加拿大的公民，在我的教學中我試著去了解加拿大社會。我記得我在 LSE 的時候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對於社會科學的獻身，以及著作和其身處的時代脈落，而現在重讀一次，發現這個社會和他們所描述的帝國主義時代很不一樣，其概念、方法、主題等等也大相逕庭。

但是後來有了女權運動，也有了一個機會讓我再過去 20-30 年之間可以投入，變成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另一個自

己。我從 Berkeley 學到的社會學很不一樣。發展一個女性為主體的社會學是我想做的事情。雖然這個目標尚未實現，仍要繼續做下去，也要和我的教學不斷對話，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發現會帶來什麼改變，但是我的知道我們可以努力去做。

現在所謂的制度民族誌是從那些我們研究、談話、寫作等活動的持續實踐中開展出來的。這可以算是社會學嗎？若你指的是主流我們在研究所上的理論課和方法課的那樣，那答案是不。這是方法論嗎？不。或許這可以被視為另一種社會學，這種社會學致力於發掘人們真實的經驗，實做、關係等超越個體層次的問題。這是我的研究領域，和其他制度民族誌學者對話。發現不是志業，是持續不斷的投入和驚豔。

而且，然而，社會學提供了論述和制度的空間讓制度民族誌可以有其場域（在其他不相關的場域也是，如照護）。今天的社會學已經沒有那種程度的一致性了，這也是我在 Berkeley 所接受的訓練。那些去近一步了解社會的關懷已經在不同的方向展開了，這裡我覺得研究和思考，特別是分享了制度民族誌的目標的知識實踐，是可以近一步轉議人們的問題和煩惱成為公共議題的。這也正是 C. Wright Mills 給我們的啟示。■

> 放眼未來

by Herbert J. Gans,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國



Herbert Gans.

Herbert Gans是過去50年來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家。他是都市貧窮領域、社會階層、族群、種族、媒體、大眾文化、反貧窮計畫等領域的領導人物。他寫過許多書，像是經典的The Urban Villagers (1962), The Levittowners (1967),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1974), Deciding What's News (1979),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ity Policy (1995) 和最近的Imagining America in 2033 (2008)。其作為一位公共社會學家，也常在報章雜誌上著述，也參與制定社會政策。他也獲得許多獎項，也擔任過美國社會學會會長。

美國就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正在歷經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其結果就是造成政治和階級的不平等。社會學家應該自問我們這個學科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特別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變遷。

可是，這個學科需要和這個國家更相關才可以，所以才能夠讓其更被看見和重視。雖然現在的社會不平等是全球性的，其國家政經之間的差異，以及各國社會學家所提出的建

議，讓我們覺得每個國家要有自己的解決辦法。這只要我們想想全球性的結果就知道。而接下來的就是美國社會學家試圖要有一個更細緻的圖像提出來，以及改怎麼辦。

有許多論著已經聚焦在這個不平等議題上，可是社會學要能夠更關注其造成的制度性影響。微觀的角度，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的不平等都需要更多的解釋。只要有可能的話，社會學研究應該要更

政策導向。這不可能去期待說真正去制定政策，這是本分之外的事情，而是說，我們的研究可以讓政策去參考，讓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可以更了解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仍然多注重在精英的現象，社會學家必須注重非精英的行動。未來的研究必須放在那些弱勢族群上面，特別是那些在平均所得以下的人民，因為他們是這個日益嚴重不平等現

>>

象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沒有什麼代言人替他們發生，也被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所以應該受到更多注意。

社會學不可能代替這群人發聲，可是可以更關注他們的問題。研究應該特別著重在社會、情感、以及其他的不平等層面。例如，過去幾十年來，特別是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了社會顯著的向下流動、向上流動的停滯、期待的降低。社會學家應該在更早之前就該把這種現象當作主要的研究領域才對。

此外，社會學家應該要更注意貧窮長期的影響，像是可能會造成的常後創傷症候群，這會影響好幾世代。同時，研究者也應該了解人們怎樣處理、對抗這樣的社會向下流動，若我們設計好一點的話，類似研究可以提供許多有用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社會學家對於那些在平均所得以下的人們的關注必須延伸到制度和行動者的層面，這是關鍵的層面，因為影響很大。研究這些造成部平等的原因是重要的，不但

對研究者重要，對於那些人的學習更是重要。

還有，社會學家應該要宣揚社會學的用處。最好是提供研究發現，點子等和當今熱門話題、議題、爭議有所相關。雖然說得比較容易，社會學家還是要少一點去做重視所謂的文獻，還要其他學科的貢獻。少一點重複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的研究，也是有幫助的。

社會學家必須繼續研究其他社會科學所忽視的問題，或他們看不到的問題。社會學家也應該更去發掘那些隱藏、不被看見的議題。

有可能的話，社會學應該重視經驗研究，量化和質化都是。儘管現在有所謂的大量資料的容易取得性，這個學科應該繼續去收集和分析小量的資料，特別是透過民族誌田野調查。透過和人們相處去了解這個社會是社會學的最重要貢獻。

這個學科應該更有創新的理論，概念也要質疑過去的傳統，像是標籤理論，關係論、建構論等。現在的不平等現象或許可

以提供我們更多的機會去用更新的角度看待美國社會。

總之，社會學應該努力去和公眾連結，透過呈現社會學的觀點和發現，以清楚、非學術語言的方式讓公眾感到興趣。大學生的教育和高中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這就是公共社會學。研究者必須不但要知道怎麼寫作，還要受到公共社會學的訓練。同時，社會學家要生產公共知識，得到的回饋和那些專業社會學家必須要一樣。

這只是我個人對未來的藍圖而已，可是我充滿希望。其他人當然也可以提出。總之這個學科必須對未來有更多的想像，才可以讓明天會更好。■

> 社會學和政治

訪談 Nicolás Lynch



Nicolás Lynch.

Nicolás Lynch 是秘魯位於 Lima 的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社會系教授。他是秘魯社會學會的會長 (1998-2000)，也是教育部長 (2001-2002)，總統顧問 (2002)，和駐阿根廷大使 (2011-2012)。他在美國的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拿到社會學士，在墨西哥 Latin Americ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拿到社會科學碩士，也在許多美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出版的著作包括了 *Los jóvenes rojos de San Marcos* [The Red Youth of San Marcos], *La transición conservadora* [The Conservative Transition], *Una tragedia sin héroes* [A Tragedy without Heroes], *El pensamiento arcaico en la educación peruana* [Archaic Thinking in Peruvian Education], *Los últimos de la clase* [The Worst of Education], *¿Qué es ser de izquierda?*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Leftist?] 和 *El argumento democrático sobre América Latina* [The democratic argument about Latin America]。他也是報紙的

專欄作者：Lima newspaper La República。同時，也是政治評論的主編：Otra Mirada [Another View]。

布：作為社會學家，你的生涯很不一樣，進出政治領域。或許我們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好了：你是政治家或是社會學家？

NL：我是社會學家，會學家並不學家只是學家因為我受過訓練，還因為我真的喜愛社會學。而我也喜歡政治，我的國家是政治與人緊密相關的，我從年輕時就從事政治活動了。

布：有趣，韋伯一直想從政，把社會學和政治清楚劃分，可是你似乎相反。我的理解對嗎？

NL：對我來說社會學是科學，是社會科學，但我們同時也是社會行動者，也是我們所研究的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學家 Alain Touraine 在拉丁美洲很有影響力，就強調這種行動者的社會學，我想他是對的。從一開始我的社會學研究就和我的政治生命有關，我的許多著作就是關於這個。

布：讓我們談談你的最後一個職位：出使阿根廷。原因是為什麼呢？

NL：我在 2009 年成為 Humala 總統競選團隊的成員，是由幾位朋友邀請加入的，而其實 2006 年我就是了，那時他第二高票。我一開始對於有人宣稱自己是左派民族主義者是抗拒的，而且是個退役將領，曾經打過 dirty war，就是 Sendero Luminoso [Shining Path]。但社會黨在 2006 年的選戰慘敗讓我和幾位友人加入了 Humala。現在想想我們的動機是對的，可是某種程度上也被騙了，因為 Humala 和妻子要的只是權勢。

布：為了感謝你在選舉時的之值，總統 Humala 讓你出使阿根廷。他要你在 Buenos Aires 做些什麼？

NL: 他讓我出使阿根廷去完成一些政治任務。秘魯和阿根廷的關係並不好，是因為在 Humala 之前的政府不喜歡阿根廷的進步政治立場。總統給我的任務是改善兩國關係，這對於拉丁美洲整合很重要，以及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也是。Humala 告訴我秘魯在這塊地圖上必須有個位置，那我就是去達成這個任務。

布：這個工作的挑戰和成就？

NL: 第一，在 Buenos Aires 的文化和知識生活可能是拉丁美洲最好的。而且阿根廷歷經了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遷，這很有趣。阿根廷在財富重分配上做得很好，人權和政治獨立上也是如此。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相比，阿根廷有最高的就業率，勞工權益也是。而在 1970 年的蕭條，他門把 200 個軍事人員關起來，這也是很特別的。因為如此，阿根廷也有很強的公民身份傳統。

布：但結果來得很突然，對吧。你丟掉了工作？

NL: Humala 政府後來右轉了。當然這個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的事情，是有長期因素的。首先，他解散了進步的內閣，然後也和左派議員劃清界線。從秘魯右派和美國那邊得來的壓力讓他放氣了原本的改革目標，然後追求新自由主義。而又轉之後，總統的新盟友想要把我弄掉，所以設了一個陷阱。或許我的錯誤就是沒有一開始就辭職，但是那時候要做出對的判斷很難。

布：陷阱是什麼？

NL: 在 2012 年的 1 月下旬，當我還是駐阿根廷大使時，我收到了一封從秘魯寄來的信，關於 Movadef 的立法。這是一個恐怖組織的前線團體寄來的，叫做 Shining Path，想要替他們入獄的領導人物特赦。後來 10 個月後，11 月上旬，一個右派秘魯報紙說我是 Movadef 的同情者，必須下台。政府沒有幫我辯護有沒有展開調查。而我和那個組織一點干係也沒有。而 1982 年我還收過他們的死亡威脅信，並暗殺了很多我的朋友，他們是恐怖組織，從來不檢討自己。不論如何右派有實力讓我走人就是。

布：我看到了秘魯政治人物可能的樣子了。但這不是你第一次擔任政府職位。你在 Toledo 政府當教育部長，這是一個企圖恢復民主的政府。請你多說一些。

NL: 這是我反對 Fujimori 獨裁的結果。我已經是 Foro Democrático 的成員，這是一個公民組織。Toledo 是一個自由中間派，代表了新的秘魯民主，並組成了大聯合政府。我的目的是展開教育改革，讓其可以改善我們的教育體系，因為那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沒有

什麼預算，水準也低。所以我必須面對兩個敵人，世界銀行和毛主義的教師工會。第一個總是要私有化一切事情，第二個是不習一切代價只想保住工作，不接受評鑑。我後來成功推動了教改，但是 Toledo 沒能抵擋得住壓力，於是我下台了。

布：我認為這種政治是危險的事業，特別是你從來沒有放棄你的左派思想！所以在這個脈落下社會學是否讓你回來？提供你慰藉？幫助你的政治事業？社會學對你來說是另一種政治嗎？

NL: 不只是慰藉。社會學幫助我了解秘魯社會和其世界上的位置與角色。關於教育的話，社會學幫我理解秘魯教育問題是意識型態和政治的問題，而非技術這種國際會相信的緣故。社會學給我工具，讓我知道教育不只是成績，而和集體的自我了解和認同有關。

我從來沒有離開學院過。34 年來我在 San Marcos 教社會學已經很久了，這也是最古老且最有名的秘魯大學。我參加過了至少 9 個大型計畫，出了幾本書，有些很重要，有些比較是政治的，有些是偏社會學的。

布：這些書很少被翻譯成英文，可以請你跟我們大概簡介一下，特別是和政治的關聯？

NL: 沒有英文的原因和我和英文學術界的複雜關係有關。例如我對民粹的研究，我研究 90 年代晚期拉美的民粹主義，想要解釋民粹的新自由主義並不存在，因為這是矛盾的兩個概念。我指出歷史上的民粹對於地區和民主都是好的。而我以西班牙文發表之後，我送到了美國重要的比較期刊上，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很長的回覆是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民粹。好，我們只是想法不同。可是那個期刊卻刊登了一篇批評我這篇西班牙文的文章，所以我的文章要發表，還不夠好，可是要被批評，卻是很適合的！我很多次都收到相同的觀點：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該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最新的書是關於拉丁美洲不同的民主理論和實踐。我想要解釋那些新的政府 -- Hugo Chávez, Lula, Correa, Evo Morales 和 Kirchners — 怎麼去發展不同模式的民主，重視重分配，社會正義、參與。這本書的目標是呈現不同民主的面貌，並分析相關的轉型和鞏固民主的論述。

布：現在有任何方式可以把社會學帶入政治爭議之中嗎？

NL: 有。例如在最近幾個月我們討論了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者和民調業者宣稱秘魯有 70% 是中產階級，但卻是用很奇怪的標準。所以我們幾個人曾經寫過社會階級、結

構、鬥爭的人，幾年後的現在又出來指出那些政治評論者的謬誤所在，讓大家知道社會學有更精準和複雜的視野與角度。

布：你在美國拿到博士並時常到美國，我想那就是我們可以在 Wisconsin 遇到的原因。那我想知道秘魯的左派在美國都從事些什麼活動？

NL: 我從墨西哥拿到碩士，我也在拉美和歐洲有許多學術活動，在美國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有很多學習的機會。我在 80 年代從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拿到博士，那是一個很好很進步的大學。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是訪問學者了，像是 Wisconsin Madison。我想我應該在美州之間開啟對話，沒有共識沒關係，重點是理解對方。

布：我想知道在你的生命史中，是什麼樣的背影，比方說家庭或是教育，促使了你日後同時選擇了這兩者？

NL: 嗯，我想對很多人來說，我並不是很適合從政，我是中上階級的小孩，沒有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受到好的教育。或許是因為秘魯的長期不平等讓我想從政和同時做社會學吧。但我一直很快樂從事兩者，兩者相互影響，我不後悔。

布：既然你已經不政府職位了，那你最近致力於什麼事情？仍然是政治事務嗎？或是寫作？

NL: 是的，我仍然熱衷政治。我是一個左派聯盟的成員，這個聯盟在秘魯各地都有影響力，我們也對下一屆的地方選舉 (2014) 很有信心。我也有一個網站是和這些朋友一起架設的，是一個政治分析的平台。我們把政治分析每天寄給 15000 個電子郵件地址，另外也有廣播平到，還有分析公共政策。像我說的我也繼續在 San Marcos 大學授課，快要完成一本書，是關於秘魯未來的長篇政治評論。

布：我想韋伯會很羨慕你！你可以在政治和社會學之間游刃有餘，不會犧牲任何一方！謝謝！■

> 權力的殖民性

秘魯觀點

by César German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Lima, 秘魯



Aníbal Quijano

這個結構方法。從 1970 年代，我們已經看到了轉社會科學轉型的複雜性，且已經重組了。Gulbenkian Commission 報告或許是社會思想裡面，特別是 20 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一個對此議題的檢視。這個報告告訴了我們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已經開始動搖，在中心或邊陲國家都是如此，而且這些思想浮現出來，企圖發展一個新的認識論。

我這為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所維持的是一個現代權力的殖民系統。這和特別看待與組織自然與社會世界的方式有關。有三個中心思想：

首先是簡化。對 Descartes 來說，瞭解複雜的過程是必要的，要把他門分成好幾個部份，好讓我們可以分別進行研究，所以清楚就是代表簡化。這個觀點導致了知識的專門化和分工，產生很多學術領域，然後發展出不同的方法與領域。學科也發展出制度的分類，好讓每個不同的學科可以存在於現代大學的組織系統內。

第二個是社會與自然系統的穩定性。這個概念把實在看作是有秩序的系統，並遵循著簡單和可知的法則運作著。這個預設了知識可以讓我們做出預

>>

有許多證據顯示我們正在歷經現代的殖民已經面臨了結構性的危機，這個殖民非常強大，已經持續 500 年。而危機是整個權力結構所必然面對的基本問題，也就是這個危機已經在各

個層面發生了，像是性別、勞動、政治、互動、自然等等，這些問題已經不是現代系統可以解決的了，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系統。

特別重要的是互動結構的危機，以及社會科學所用來認識

測，然後控制，不僅是自然，還包括社會。這個信念產生了決定論和可回溯論，也就是事件可以重複，歷史因此不再有偶然。

第三是客體性。這個是說實在是可以知道的，而且主體可以放入括弧之中。結果就是認為知識是價值中立的。

在殖民的現代權力模式裡面，歐洲中心主義強加了上去，把這種知識系統看成是唯一正當的系統，所以邊緣化和排擠、甚至消滅那些被殖民的知識系統。這些知識暴力的排擠和邊緣化那些邊陲的知識，所以其目的是要去消滅那些知識形式，把他們看作是劣等的。

這個殖民現代的權力模式中，邊陲開始質疑歐洲中心的知識模式。主要的貢獻包括的後殖民研究、從屬者研究，以及許多非洲知識分子的著作。在這個思潮裡，一個分析性的「殖民—去殖民權力」提供了最有用的方式去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系統，而且也提供了去瞭解現代社會和未來的方式。由 Aníbal Quijano 在 Lima 於 2010 年 8 月所主持的 The Questions of Dis/Coloniality and Global Crisis 研討會就是這一系列辯論的高潮，也是起跑點。

殖民—去殖民權力的分析提供了知識論的觀點，可以用來瞭解實在，也提出問題和回應給相關的議題，特別圍繞在人類的社會生活。這開啟了許多歐洲中心主義知識論所看不到或消除的對話。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方式因此受到這個架構的挑戰，進一步來說，這個分析架構質疑了現代殖民資本主義知識生產體系的最根本預設，而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去檢視這些知識論和理論的預設，提出可能性，挑戰霸權。我試著去梳理這些疑問，然後檢視社會理論的重組可能。

若按照 Aníbal Quijano 的理

論，我認為在 1492 的歐洲征服美洲導致了這種權力模式，預設了現代性和殖民性。另外，這也是透過定義殖民性，而權力關係在這段期間備件立起來，並且和「種族」的概念糾結在一起，是社會分類的一個基本核心方式。話劇話說，征服者想像他們是高等的人類，並認為自己是白人，而被征服的是次等得人類，是印地安人或是黑人。為了要自然化這個社會關係，種族正當化了對原住民和非洲人的宰制和剝削，這在殖民獨立戰爭之後仍然如此。這保證了自然的宰制和被宰制社會關係。同時，現代性作為殖民性的另一面，理性化社會生活，科學和科技進步是唯一的發展指標。(1)

認識論的去殖民化要去質疑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的預設，然後提出另外的詮釋，這或許可以發展出了一個更好的知識論，也可以更平等和民主。我提出五個質疑，這些針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也是五種另外的詮釋架構，以我的權力殖民和去殖民為基礎。

1. 質疑國家作為一個瞭解社會生活的分析架構。國家結構不可以被認為是社會關係的邊界，所以這個全球的分析單位要強調現代殖民模式如何在 16 世界產生，然後歐洲怎麼征服了美洲。

2. 質疑殖民權力的概念，然後瞭解剝削和宰制的關係，這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們不僅是要檢視經濟、法律、政治、的剝削和宰制，還要去看在現代殖民系統內這些權力關係是怎麼相互連結在一起成為象徵和正當的觀念，並且以「種族」的概念被再現出來。所以，建構起全球資本主義的歐中權力剝削模式是相當種族主義的。

3. 質疑簡化的認識論，特別是那種為了要瞭解社會複雜性而去把知識對象分割

為許多獨立的片段。所以權力殖民的分析強調瞭解全球、現代殖民的權力模式是一個歷史的整體。這是說，其瞭解權力是一個複雜多變的系統，相互糾結，並在 16 世紀出現，然後現在正在歷經結構性的危機。從這個觀點而言，絕對武斷的學科學區分，像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是沒有用的。然而，我們應該把這個視為是歷史過程的偶然。此外，社會知識的專門化從歐洲 19 世界的社會科學歷史建構而來，是沒有任何認識論正當性的。並且只在某些特定的領域和問題適用。

4. 質疑主體和客體的二分。這裡所要挑戰的是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因為這兩者觀點都預設了實在的全知性。特別指社會實在。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去承認世界存在在主體以外，但是這個主體介入了社會知識的生產，所以改變了其所測量的對象。因此，知識是一個互為主體的產物，並且以互動的結構和知識論法則、社會法則所見立起真理，以及被理解。

5. 質疑科學的人文知識的二分。若科學知識可以被從經驗研究的過程分離出來，特別關注真理的追求，以及人文學科討論倫理和美學，則知識的殖民分析要強調的是知識在每一個生產的環節都是真的、善的、美的。這很重要，我們因此期待這個被現代性理性和除魅的世界可以再一次魅化。

總結來說，我們所提出的知識論觀點可以被普遍化，也可以延伸到很經驗的理論層次，普遍理論是關於權力的全球模式，危機，以及歷史的新的可能選擇。而經驗的理論是關於

>>

權力歷史模式的最特別的領域。

注 1: Aníbal Quijano 介紹了權力殖民的概念 (1991), 其後來的著作包括了 Quijano and Wallerstein (1992) and Quijano (1993, 2000a, 2000b, 2000c, 2001, 2003, 2004, 2007, 2009 and 2010). For a debate about this concept, see the following texts: Mignolo (2003), Escobar (2003) and Pachón Soto (2007)。

References

- Escobar, A. (2003) "Mundos y conocimientos de otro modo: El programa de investigación de modernidad/colonialidad latinoamericano." *Tabula Rasa* 1: 51-86.
- Mignolo, W. (2003) *Historias locales/diseños globales: Colonialidad, conocimientos subalternos y pensamiento fronterizo*. Madrid: Akal.
- Pachón Soto, D. (2007) "Nueva perspectiva filosófica en América Latina: el grupo Modernidad/Colonialidad." *Peripetias* 63.
- Quijano, A. and Wallerstein I. (1992). "Americanness as a Concept or the America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34, UNESCO: 617-627.
- Quijano, A. (1991) "Colonialidad y modernidad/racionalidad." *Revista del Instituto Indigenista Peruano* 13.29: 11-20.
- _____. (1993) "Raza, etnia y nación en Mariátegui: cuestiones abiertas." In: Aníbal Quijano et al. (eds.)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y Europa: El otro aspecto del descubrimiento*. Lima: Amauta: 167-188.
- _____. (2000a) "Colonialidad del poder, eurocentrismo y América Latina." In: Edgardo Lander (ed.), *Colonialidad del saber: eurocentrismo y ciencias sociales. Perspectivas latinoamericanas*. Buenos Aires: CLACSO/UNESCO: 201-246.
- _____. (2000b) "Colonialidad del poder, globalización y democracia." In: *Tendencias básicas de nuestra época*. Caracas: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Pedro Gual: 21-65.
- _____. (2000c) "Coloniality of power and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6.2: 342-386.
- _____. (2001) "Colonialidad,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In: Walter Mignolo (ed.), *Capitalismo y geopolítica del conocimiento. El eurocentrismo y la filosofía de la liberación en el debate intelectual contemporáneo*. Buenos Aires: Signo: 117-131.
- _____. (2004) "O 'movimento indígena' e as questões pendentes na América Latina." In: *Política externa* 12.4: 77-97.
- _____. (2007) "Don Quijote y los molinos de v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In: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10.16: 347-368.
- _____. (2009) "Des/colonialidad del poder: El horizonte alternativo." In: *Pasado y Presente* 21.
- _____. (2010) "' Bien vivir' para redistribuir el poder: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su propuesta alternativa en tiempos de dominación global." In: *Oxfam Annual Report 2009-2010: Pobreza, desigualdad y desarrollo en el Perú*.
- Wallerstein, I. (1997) *Abrir las ciencias sociales*. México: Siglo XXI.

> Chiapas: 面對不平等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美國,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of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ISA研究委員會(RC07)會長



Maya原住民爭取女性權利。Markus Schultz攝影。

2014年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20週年。這個協定是加拿大、墨西哥、美國的自由貿易條約，也是第一個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條約，作為日後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和大西洋夥伴關係(TTIP)的基礎架構。在老布希政府時協商，在柯林頓時簽約，這個條約是解除關稅讓出口貿易公司受惠、也損害勞工權益和增加環境問題

的條約。

2014年也代表了Chiapas原住民反叛的第20年。當Zapatistas在NAFTA生效的那天揭竿起義，他們開始為了土地、公民權、尊嚴、民主、社會正義而奮鬥，並且邁向全球抗爭。過去些年來，Zapatistas有了批判的論述和組織了跨國的社會運動網絡，並有大型的抗爭，分別在Seattle, Prague, Genoa等舉辦高峰會的地方行動，這

>>



些地方都是全球精英談論事界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的地方。

雖然媒體沒有報導 Chiapas，但是若要說 Zapatistas 運動已經消失，那是錯的。抗爭仍然持續，只是換了不同的方式。Maya 的社區運動已經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自主社區，試驗自我治理的草根模式。輪流的地方和區域委員會會員是以 mandar-obedeciendo 的原則去組織，也就是 to govern by obeying。在 2012 年 12 月，Zapatistas 讓大家見識到了其可以動員上萬人的能力，並發動無聲遊行，通過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這是高地的主要城市。

過去的夏天，Zapatistas 開始了最後一個方案，就是邀請訪客到該社區去學習什麼自由。「小學校」(escuelitas) 說，這個世界不是要去教導原住民什麼是發展，而是去看、去聽、去學習，看他們怎麼想出新的社會另一個世界，怎麼開創自主管理的

參與結構。Escuelitas 不是長篇大論的演講，而是第一個從每日抗爭的實踐中去學習第一手的經驗。

而超過 1200 人，來自各個年齡層，包括墨西哥等全世界的國家，也包括運動者、藝術家、知識分子、農民、音樂家、詩人、小販、學生等，都前來學習。這個學校不收學費，空間是免費的，交通甚至也免費。出席者只被要求繳 100 披索 (10 美元) 去印製學習材料，而密封的罐子提供了匿名捐助的機會。Zapatistas 解釋那些捐獻大戶不用覺得自己偉大，而沒什麼錢捐款的也不用覺得羞愧。

會議提供了發問和回答的議會，都是關於 Zapatistas 的觀念和原則，但是最主要的學習部份是在社區裡面進行，那裡已經規劃了數月了。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 Votán，或是稱為家教，最為這個社區教學的代表。「沒有老師，」Zapatistas 的發言人說，「但是有集體的人在

教學，形成整個學習和教學的有機體。」

其中一個家教的故事值得一題。一位年輕的 Tzotzil 代表了他世代的經驗。在上了兩年的學校之後，他現在自己教書，地點就是該社區的小學。他在 Cancún 也有過不同的生活，當初因為想要賺很多錢，於是到了大城市工作，當過建築工人，餐廳、旅館服務升等等。他說他對城市五光十色、光鮮亮麗生活的嚮往驅動他這麼作，可是他到了那邊看到的卻是貧窮的多數人和少數的有錢人住在郊區海邊。他忍受了這樣的生活一年之後，終於覺得夠了，於是回到社區，他喜歡有尊嚴的生活更勝於規訓，喜歡社區更勝於競爭。

抗爭的 20 年後，自主的學校系統出現了，而 Zapatista 的社區制定了課表，這是按照他們的需要、價值、喜好所制定的。他們一開始的時候蓋了一個中學，位於一個區

域中心。在那裡學生可以待上2的星期，特別是遠途的通車生。小學在地方的層級蓋起來了。由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擔任老師，而 Zapatistas 認為這個系統遠比那些官方的學校好上太多了，那些政府的學校老師都不會說方言，對於到偏於地區教學感到不自在。而 Zapatistas 的老師偏好去稱其為教育推行者，因為他們不喜歡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而喜歡教學相長的模式。他們的教學沒有拿薪水，而整個社區也提供了建築、食物、休息時間、以及衣服的费用。

在社區裡面共同生活包括了一起工作、種植蔬菜、水果、游泳、洗衣服、準備食物、然後一起進餐，唱歌，講故事等等。若要用物質的方式歸類，那麼這種社區的生活水準是很窮的。建築物都很簡單，而且只有很粗糙的地板，沒有現代的射之也沒有電。另外一方面，那裡卻有很多優點，環境清幽，遠離塵囂、工業污染。附近的溪流提供了乾淨的水。而飲食包括了主要是玉米、米、豆、蔬菜、偶爾有蛋，但是通常沒有肉或是汽水。大部分都是地方生產的，新鮮、有機、好吃。或許最重要的

是，這個社區有著尊嚴，因為其自主性而驕傲。

玉米是 Maya 的主要作物。NAFTA 讓墨西哥農民處在和美國競爭的環境裡面，而美國的玉米是透過工業方式大量生產的，有著政府的大量補貼。這個帶給了那些農民很大的壓力，必須放棄土地，然後到大都市找工作。Zapatistas 持續種玉米，自給自足，用傳統的方式在 Milpas 種植。那是小的田地，同常在坡地上面，和其他的植物一起生產，像是可吃的野草，黃瓜，特別是豆子，因為可以用玉米梗去種植。而 Zapatistas 反對基因改良食品和種子，像是那些 Monsanto 的種子。

主要的轉變是在性別場域。革命的女性法律支持性別平等，當這個和傳統父權有著很深的切割之後，許多社群採用了，而且更快。例如，當面臨了交通和食物的龐大費用之後，那些距離學校很遠的家庭必須把小孩送到學校，但是只有男生，沒有女生。可是，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人支持性別平等了。例如年輕男性不再認為洗衣服是女性的工作，而可以自己洗衣服了。類似的，越來越多的女性擔

任教育推動者，也擔任健康推動者，還有自治政府的人員。

墨西哥政府對於 Zapatistas 的策略性回應隨著時間一直改變。本來他們終止了在抗議之後採用的軍事行動。最近，政府支援了農村永續城市的建立，必且在 Zapatista 的農地旁邊蓋農田，可是保證的工作卻不見了，因為補助沒有了，那些好看得建築也都沒人進駐，就像廢棄的一樣。雖然最近有沒有武力鎮壓，當事還是有許多飛機經過。Zapatista 認為現在的墨西哥總統因為不公平的選舉和媒體而當上總統，整個政治系統是貪污腐敗，所以他們不想和政黨合作。

Zapatista 的反抗同時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這是關於自治和自給自足的抗爭，開創了一個新的新的社會模式，相當吸引人。他們對於社會正義的答案起於自由。他們不要求允許，但是他們願意實踐。建構性的調整政策已經讓都市的貧民窟越來越多，全世界都是。現在是時候去用新的發展方式，游下而上去創新了。全球社會學和關注不平等的社會學透過去看全球南方的草根例子一定可以受惠良多。■

> 敘利亞的監獄

去連結和去主體性

by Abdulhay Sayed, formerly with the University of Damascus, 敘利亞

有一個報告是由卡達所資助撰寫的，也是由前聯合國檢察官獨立所寫的，在這份報告中，齊分析了上千張的照片，照片是關於許多受到酷刑、飢餓對待的屍體，他們都是敘利亞的囚犯，這提供了近一步的線索去發掘所謂的大規模屠殺殺囚犯的現象。這份報告也由敘利亞的民間人權組織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其描述了現今敘利亞監獄的慘無人道的狀況。這篇文章將聚焦在當事人證詞而非圖像。的確，現在有許多證詞的檔案，我關注在囚犯如何生存、如何受到虐待、如何瀕臨死亡、如何看到其他人在死前的去連結化。我問一個問題，就是在什麼樣的程度上，他們有歷經 Muselmänner 的狀態，也就是 Auschwitz 集中營生還者 Primo Levi 等其他人的經驗，這由 Giorgio Agamben 形成了典範，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現在在敘利亞監獄的去連結化悲劇，以其敘利亞政治空間的災難。

對於許多生還者而言，有越來越多的囚犯，特別是些因為和平運動而遭逮捕的人，會在監獄中死去，然後祕密被埋葬。這寫證詞經常地指出囚犯怎麼面臨有限的空間和過多的監禁人口。而刑求的狀況變得越來越規律。暴力和不人道

的對待並不只出現在審問時期，也出現在生活中。

由敘利亞草根人道組織 Violation Documentation Center (VDC)——由律師 Razan Zeitounh 所創立一所收集的資料可以看到，獄吏時常用飢餓對待的方式讓囚犯崩潰。飢餓被用來當作刑求方式，也是讓生還者永遠無法忘記囚禁痛苦的方式。艱困的囚禁環境通常造成「去連結」，這裡是一個在 Damascus 的 Qaboun 的生還者所描述的許多人的遭遇：

我被放到一個 5 公尺的房間，大約有 180 個囚犯在那，他們都是「去連結化」的人。這個詞我們用來只那些行為因為刑求和高溫所造成的行為崩潰的人。我們每天會看到一或兩個人去連結化，原因包括心裡壓力、濕度、高溫等等。囚犯會因此開始胡言亂語、

失序…

當一個去連結化的囚犯死了，會有一個系統化處理屍體的方式，把他消除。在某些監獄中，這個行動是由資深的囚犯去執行，因為他們被強迫去處理這些

敘利亞雕刻家 Fadi Yazigi 用青銅造的作品：樹。



屍體和帶走。在其他監獄，這個等待死亡的地方通常在洗手間旁。這些生還者的記憶指出，這些去連結的囚犯就在等等他們緩慢的死亡，這裡有一個生還者所描述的景象：

每天大約 20 個左右的囚犯被趕到走廊，去面對緩慢的死亡。這些個案從被虐待到快死，到高溫快熱死都有，就像行屍走肉一般。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大小便，充滿血汗糞便。他們都快死了。他們的眼睛雖然張開，可以看，就像是要其他還可以走動的人去揭露這一切給外界知道。

一個人特別會被這種延長的瞬間和囚禁的經驗所衝擊，而且當心智已經被去連結的時候特別如此，因為整個身體在一種最地限度的狀態，瀕死之前的狀態。人很顯然要在 Auschwitz 集中營，有就是 Agamben 最近在 2005 年的書 *Remnants of Auschwitz* 所說的 Muselmann 中劃上一條平行線。Primo Levi 作為 Auschwitz 的生還者被稱作 SS 也是 Muselmänner 的囚犯，其描述是很有畫面的：Muselmänner 不是人類。他們無聲的走動，身體衰變，頭低落，肩膀彎曲，眼睛無神。跟具生還者的證詞，Muselmänner 的人就是活著的死人，行屍走肉，木乃伊人，跟在其他集中營一樣，只是稱呼不同而已。我們對 Muselmänner 的研究其實很少。

透過 Muselmann 的概念，Agamben 對於兩個相關的問題很感興趣：在集中營的經驗如何可能，以其納粹是在那裡殲滅有囚犯和證詞的？此外，納粹政府怎麼去主體化人類？Agamben 顯示了透過飢餓化他者，讓他者達到 Muselmann 的程度，權力就站在時間這邊。這建立了生與死之間的第三領域，也是透過去主體化的過程，把人話約到生物性的存有，權力讓他們在這個層次生存下去。

雖然一個人想要在去連結和去主體之間劃上平行線，也就是在意識和生物之

間區隔開來，這通常會在此停住，的確，在 Auschwitz 的 Muselmann 和敘利亞之間有許多不同。Muselmann 是 Auschwitz 的意外，因為其目的是殲滅。可是敘利亞的去連結化是政府的核心角色。去連結化的圖像作為主要的功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這必須進到生還者的經驗之中才得以可能。這些證詞構成了去連結的整個完整圖像。沒有所謂「沒有生還者的去連結」，也沒有「沒有去連結的生還者」。去連結的經驗必須由生還者提出，然後讓敘利亞人民感覺到由衷的恐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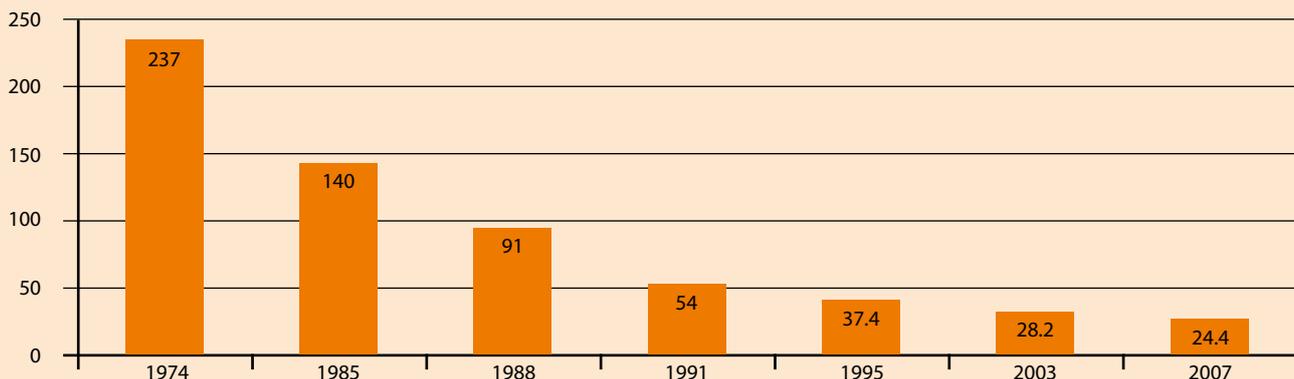
近一部而言，muselmannization 是敘利亞囚犯所展示一個政權如何代表和處理政治空間的例子。這個政府的權力機器不是主要用來消除人民分類的，而是去消除人民的能力，讓其沒有能力去反對，沒有能力在公共空間行動，藉著用把人民化約成生命政治的單位，或是一種可以任意丟棄的人口，去達成那些目標。個體層次的謀殺和移除不是這個權力的目的，這只是手段，這種手段用來臣服社會。面對和平的社會運動，政府逮捕示威者然後把他們丟到監獄，剝奪一切政治權利、然後去連結化，丟棄。

一個人可能去在敘利亞監獄的個人創傷和敘利亞政治的身體政治中平行移動嗎？這裡刑求、那裡毀滅城市。把囚犯帶到這裡連結化，而讓在公共場合和平集會的人民主體消失。愛這裡堆積屍體、在那裡驅散人群。當然，這在理論上是平行的時空，但是這真實再現了敘利亞的悲劇情況，並且政府系統化的摧毀這個國家人民的自由。■

> 伊朗女權的進步？

by Shirin Ahmad-Nia, Allameh-Tabataba'i University, | 伊朗

伊朗女性死亡率1974-2007



Source: "Health Profile Indicator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enter for Health Network Development & Health Promo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2009

伊朗的社會從1979年革命以來歷經了巨大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變遷，最明顯的是家庭、教育、都市。

在革命以前，伊朗有少於一半的人口住在都市(47%)，而按照上一個國家人口普查(2011)指出這個數字現在是71%。超過50年來(1956-2011)的都市人識字率從39%增到88.9%。而性別差異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領域也減少很多。

統計指出，大約十分之一的家庭是女性領

導，而單身、離婚者也增加很快。可是，伊朗的文化反對女性進到勞動力市場。傳統價值支持性別隔離，男性是唯一的家長，可是女性即使機會變多了，但是就業者只有12%，和革命前相差不大。這和女性的教育程度增加以及大學畢業生增加的景象差距甚大，許多領域中失業率甚至女性是男性的兩倍。

儘管對女性有歧視，女性的高等教育取得增加了接觸國際媒體的機會，資訊和通訊科技的普及也帶來了

>>

文化全球化，因此她們熟悉新的價值和理想、生活習慣，多元文化等等，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年輕女性的認同。

年輕一代的女性已經重新定義性別認同，不同於傳統的母親或是妻子的角色只能參加社區文戶活動，年輕人開始進入經濟領域。進入公共領域，儘管有文化差異，這都培力了女性，讓她們經濟自主。隨著增加的潛力和能力，年輕女性可以作主自主選擇，創造新的家庭圖像和生活方式。

當早婚(大概在青春前期)是傳統價值所支持的時候，在 Shah 的時期這個政策幾乎沒變，而經過了五十多年結婚平均年齡從 18 增加到了 24 歲。同時，家庭的規模也減少很多，從 4.8 到 3.5 人。生育率也下降到 6 人到 2

人，全體人口的增加率從 1955-65 年的 3.91% 到 2011 年的 1.29%。

因為家庭計畫在 1989 年重新開始，結婚女性使用避孕的比率增加到 74%。這個減少了生育率和非意願懷孕，而每十萬人的孕婦死亡人數也從 237 人減少到 21 人。這個進步也反應在平均女性壽命，到 2011 年增加到 75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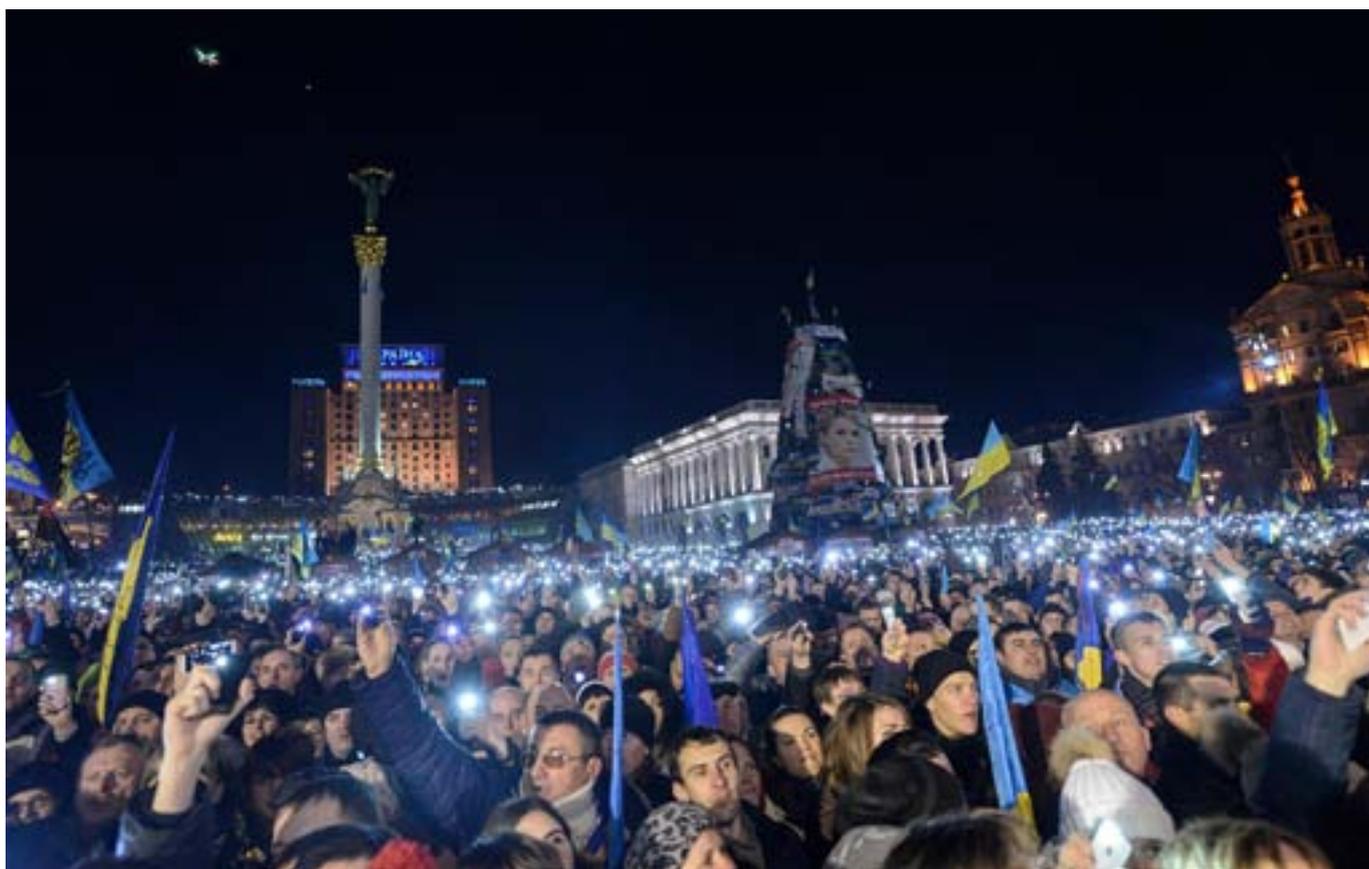
這個社會文化變遷也對獨立擇偶、婚前性行為，家庭分裂有關，擇偶現在發生在大學、工作場合、公園、購物場、網路、聊天室、街上、宗教慶典上，年輕人只要有空間交友就可以發生。結婚不再被長輩所限制，而高離婚率(Tehran 於 2012 年 1/3 的離婚率)也增加了非典型關係的數字，像是非永久伊斯蘭婚姻 Sighe or Mot' e 是對於高危險

性行為、婚前性行為、婚外情的回應。

有很少的國家層次研究聚焦在性和生育健康議題上，特別是青少年。可是證據指出地方上性經驗年齡下降到很低。此外，非傳統的關係也導致高危險行為，讓年輕人口暴露在性病 HIV/AIDS 的風險下，這些都和休閒的生活習慣改變有關，鼓勵了現代消費，可以輕易買到酒。這些都不被宗教和法律允許，所以也顯示出了警訊。■

> Euromaidan 反叛運動

by Volodymyr Paniot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General Director, 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KIIS), and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Logic and Methodology (RC33)



烏克蘭搖滾樂團, Okean Elzy [“Elza’s Ocean”] 在12.14.2013的Maidan運動上表演。

「Maidan」是個特殊的社會現象，「暴民」、「聚會」、「示威」等詞彙都不能精準描述。技術上，Maidan指的是Kyiv的獨立廣場，但是現在被用來指涉那些被運動者佔據的建築

物和城市。整個Euro-maidan現象包括了4個時期。

> 第一階段：抗議開始

烏克蘭和歐盟原來已經準備11月28-29於Vilnius的東部夥伴關係高峰會簽訂聯盟協議，

而讓烏克蘭人民驚訝的是後來政府取些簽訂了。而Maidan第一次聚會是在11月24日，有5-10萬人參加，這是2004年橘色革命後的最大抗議。歐盟的支持者開始在街上搭帳篷準備長期抗戰。從

>>

Maidan 之後，烏克蘭人用這個字代表廣場。而接下來則用 Euromaidan 稱呼。

➤ 第二階段：攻擊抗議者及改變

在 11 月 30 日，上百警察，也就是 Berkut，使用武力驅散示威者，許多是年輕人。這早成很大的衝突，示威者被驅離 Khreschatyk，也就是主要街道，然後聖麥克天主教堂的修士打開門讓大家避難。

這些事件引起了公憤。雖之接下來的星期日 (12 月 8 日)，一群大約有 70 萬的示威者和上百萬民眾到了 Maidan 然後佔領街頭，包括 Kyiv 和西邊地區，到了這裡的人是要做什麼呢？民主基金會做了調查，是由 Kyiv 的國際社會學機構 (KIIS) 在 12 月 7 日和 8 日發起的。還包括 1037 個親自訪談。後續調查在 12 月 20 日進行，那天是周間，包括了許多運動者。

有必要說幾句話關於方法論的部份。我們發現這個出口調查和街道訪談不是很適當，因為人數一直在變，介於五千到兩萬人之間，後來 10 萬人參加了週日集會。所以我們的方法

需要調整。我們的抽樣選擇了幾個區塊去進行隨機抽樣，然後在某個特定時間做出口民調。對於 Maidan 的運動，我們把訪談點化分為幾個時間點，然後去訪談那些離開建築的人。訪談人半徑 3 公尺之內的人的會訪談，可是實際上這個界線是看不到的，而監督者會觀察整個訪談，照相，然後對樣本進行加權。

兩個動機讓大家去參加運動：運動於 11 月 30 日遭到暴力鎮壓 (70%)，Yanukovych 的拒絕簽署協議 (54%)。其他動機還包括了要改善烏克蘭的生活 (50%)，以及改變國家的結構 (39%)。Maidan 的受訪者則說訴求包括了：釋放被捕運動者和停止鎮壓 (82%)，政府下台 (80%)，Yanukovych 要辭職 (75%)，和歐盟簽協議 (71%)，開啟鎮壓示威者的真相調查 (58%)。總之我可以說主要的要求是社會正義和人類尊嚴，這也是為什麼記者說「尊重革命」。

或比較 Maidan 運動和 Maidan 抗議，前者大多從 Kyiv 之外而來 (81%)，而後者多數是 Kyiv 居民 (57%)。在非居民中，從西烏克蘭的

人佔了兩者的多數 (42 前者，52% 後者)，代表了運動裡面有比較多的非居民。而參加者的教育程度很高：有 64% 人有大學學歷，沒有的 13%，而占領者裡，60% 是專業者，創業家、管理階層。換句話說，參加者主要是中產階級。而運動者裡面的專業者較少，少於一半的抗議者，而大學畢業者也少於一半。

➤ 第三階段：激進化

Maidan 運動持續了好幾周，但是訴求不被聽見，持續有人被捕。抗議者住在零下 10 度的環境裡面，於是激進化了。在 12 月 16 日，議會通過了更嚴格的法律懲罰抗議人士 (被記者稱為獨裁)，公眾的憤怒一觸即發，抗議人潮遊行到議會，被警察擋下。在 Grushevskovo Street 的衝突裡面，許多人受傷和死亡，警察把人帶去森林裡面痛打一頓。有人的屍體被找到，許多人失蹤。

2 月 3 日，民主聯盟和 KIIS 重做了一次調查，前一次是 12 月 20 日。在這個為期一個半月的佔領運動後來變成了武裝基地：Maidan Sich。Sich 指的是 Zaporozhian Cossacks

>>

象徵烏克蘭獨立。武裝者越來越多，那些要衝進政府大樓的人從 38% 增加到了 56%，那些像要佔領的人從 19% 增加到了 41%，而要武裝的從 31% 增加到了 50%。民調和媒體報導都指出了激進化現象，而對運動的態度則依地區而異。一項由 KIIS 從 2 月 8 日到 2 月 18 日做的調查中指出所有烏克蘭包括 Crimea 裡面的人有 40% 支持該運動，總數是 2032。但是從東部到西部數字從 8% 增加到 80%。

> 第四階段：暴力鎮壓與運動的勝利

2 月 18 日，激進化快到高點了，Maidan 運動被警察包圍，狙擊手就定位，衝突於是爆發，持續數日，只有在 2 月 19 到 20 日有中斷一下。攻擊武器兩邊都出現，在這 3 天中，超過 100 位的抗議者被殺或死亡，5 位警察死亡。此外，超過 1500

> With which side do you sympathize in the current conflict in Ukraine?

PERCENTAGE SUPPORT FOR	REGIONS				
	Ukraine Total	Western	Central	Southern	Eastern
Government and Yanukovich	23	3	11	32	52
Protestors	40	80	51	20	8
Neither side	32	13	33	42	39
Hard to say	5	4	6	7	1

的人受傷，300 失蹤下落不明，這是國家的悲哀。2 月 21 日，議會裡面有政黨成員支持運動，投票要取消鎮壓，把警力送走。

同時，波蘭、德國、法國、俄國的代表、總統 Yanukovich 簽署了協定，但不解決危機，可是，同一天晚上他就消失了，大家發現他逃到俄國。所以議會組織新的政府，宣佈總統改選。這一切依照憲法。而議會主席暫代總統一職。烏克蘭政權從此變天。■

3 月 9 日收到稿件。

> 革命還沒開始

by Volodymyr Ishche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ociety Research, Kyiv, 烏克蘭



運動的激進化，特別是在國會通過限制集會的法律後，1.16.2014.

由東部和南部烏克蘭所謂的「分離主義者」所發起的事件正在快速發展之中，其中俄國軍隊也介入 Crimea 的事件，而這時候所有試圖想要一般化的理論企圖都只能是暫時的。總統 Yanukovich 的政權被推翻了，而新政府已經掌控了整個烏克蘭，並宣佈了第

一個政經改革方案。

許多分析家和運動者已經把整起事件歸類成「革命」：「民族」、「民主」、「反殖民」、「布爾喬亞」等各式各樣的革命。不過，事實上就是有一群烏克蘭人發起了一場反叛（主要是西部和北部的人民，而且南部和東部的人並不支持），

>>

而且幾乎群龍無首，由政黨把持，包括了好幾次的警察和民兵的流血衝突。結果是統治精英的汰換。雖然某些政治學者宣稱這已經是 Tilly 式的革命了，(1) 但是，統治精英下台的結果其實未必符合革命的定義，因為革命尋求的是更根本的制度與結構的改變。

而這場反叛事件會帶來烏克蘭的階級或經濟的改變嗎？經濟事實上還掌控在同一群人手上，就是金融與工業的團體，他們和國家關係緊密。此外，現在他們的權力更甚從前。烏克蘭的「巧克力」國王 Petro Poroshenko (在 Yushchenko 和 Yanukovych 政府都有任職) 已經是總統選舉最有可能出線的候選人了，而為了要在反對他的東部地區建立統治正當性，新政府指派了最副有的人擔任那些地區的地方首長 (Ivan Kolomoiskyi, Serhiy Taruta)。

政治或許變得更多元，但未必更民主。Yanukovych 家族想要獨攬大權的野心已經被更集中的寡頭精英索取帶，雖然新的 2004 年憲法給予議會更多的權力，削減總統實權，但是還是沒有比較民主。議會選舉將會以比例代表制為主。而憲法也沒有提出任何方式給予人民去監督那些政黨候選人 (像是透過黨內初選)。所以政黨領袖有不受拘束的權力，可以決定候選人名單，並可以開除異議者。所以這種議會制有可能回重蹈 2014 年 1 月 16 日的覆轍，也就是當初違憲立法限制了人民的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

Maidan 運動的其中一項訴求是：讓人民走上街頭的原因，以及新政府必須快馬加鞭去做的，就是政府的透明性。這個議題不能忽視，也不能因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就反對之。建立一個有效和透明的政府制度是烏克蘭的一項大突破。然而，可是這也不可能在忽視不平等和貧群問題的情況下達成。現在我們只有看到往返方向走去：政府已經宣佈同意 IMF 的所有擰節方案，因為政府急需貸款，可是這樣只會惡化不平等。此外，任何追求透明政府的努力都會被寡頭所拒絕，因為他們得到了許多利益，並且在競爭中總是可以得利。國際競爭

勢能限制烏克蘭資本主義擴張的最強因素，因此保護國家的重要性正面對了歐盟和俄國的競爭。矛盾的是，烏克蘭的反殖民革命似乎增加了其經濟的依賴程度。

在國際的支持下，暴力被視為是和 Yanukovych 政權對抗的有效辦法。(2) 然而，也有許多不好的後果。那些人裡面也有「右翼」，包括了新納粹，並在外圍迅速崛起，幾個月內變成很有影響力的一群。可是這些抗議者並不像俄國媒體和左翼團體所稱的「法西斯」，因為法西斯是由上而下、有組織的武裝佔領，這在烏克蘭並沒有發生。右翼和整起運動都不受政黨所控制，並且取得武器，受到人民的支持。

就像過去的革命一樣，外國的介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導致了孱弱的解放能力，然後民族主義者把民主和社會的能量壓縮了。因此，社會經濟的反叛如果再發生一次，反對新政府的擰節和寡頭，那將會是由極右翼所領導，不會是新左派。如此一來，在這個文化分裂的國家，更廣大的運動會沒有空間展開，並且在沒有社會改革的基礎下，國家將分裂。

2014 年 3 月 9 號接受稿件。

註 1：<http://www.psa.ac.uk/insight-plus/blog/ukraine%E2%80%99s-euromaidan-tillyan-revolution-can-lead-second-crimean-war>

註 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2/26/why-ukraines-yanukovych-fell-but-so-many-analysts-including-me-predicted-he-would-survive/>

> 改變人類的發展

by 李遠哲，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ICSU)，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台灣；楊為植，ICSU 會長特別助理。

“Neither gradual progress nor incremental tinkering will suffice”

多年前我們討論過透過限制發展避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危險，當時一位非洲代表發言說：「不，我們國家的人民窮困潦倒，我們需要發展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若是發展意謂著毀滅地球的話，那我們就一起同歸於盡！」

這句話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們越是拒絕這個同歸於盡的論調，就是越彰顯了這個事實：這世界上還有很多窮人需要更好的生活，因為人皆生而平等。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還有 13 億的人無電可用，25 億的人每天只能用 2 美金過活，可是那些富有的人卻揮霍無度。

沒錯，這些人消耗了太多的資源了。我們人類每年超用了地球生產資源的 50%。(1) 在 2012 年有 105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發出了這樣的警告：過度消耗和人口過剩是地球對大的敵人。(2) 若我們繼續現在的生活方式，科學已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紀地球將會升高 4 度，氣候會驟變，物種會滅絕、災難將會吞噬所有人類。(3)

這是 21 世紀人類的困局：資源和能力都有限的地球卻要消化掉這過度浪費的人類生活。這 70 億的人用掉太多有造成太多的困難了。其中的 25 億人應該受到更公平的對待。而 2050 年之前，人口會還多增加 20 億。

> 如何增進人類福祉卻又不浩劫地球？

若要說現在的發展模式很好，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70 億的人採用這種模式，那就是帶來痛苦和環境浩劫。若有 90-100 億的人用這種模式，那地球就會毀滅。

> 要有新的辦法

若要讓每個人在地球的有限資源前提之下都可以有尊嚴的生活，那我們唯一的機會是徹底改變我們現在的發展模式。漸進發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唯有徹底改變才是出路。人們或許會問：那這種真正永續的發展模式到底是什麼？答案可能是複數的，而且要人們一起集思廣

益。無論如何必須滿足 3 個目標：

-- 永續的環境必須讓地球有能力承擔全人類的生活，人類的未來端賴它。

-- 永續的環境必須限制成長，包括了人口和消耗，因為無限的成長不可能發生在有限的地球上。

-- 永續的環境必須平等，因為唯有平等才可以發展出一種新的所有權概念「這是全人類的地球，我們都必須為它服務。」

一言以蔽之，永續發展是兼顧現在與未來的需要，並平均地分配有限的資源。

> 社會學家怎麼參與貢獻其中？

問題應該這麼問：若連社會學家都無法做出貢獻的話，那還有誰可以呢？這個地球的危機，根源並不在物理，而在不永續的人類發展，也就是人類的制度、行為、價值。換句話說，這是正是社會科學長期以來所關心的，也是真正的戰場所在。

「那自然科學和科技的角色為何呢？」你或許會好奇問道。沒錯，科學家對於低碳社會很重要，但只有科學並不夠。事實上，科學和技術已經是資源剝削、過度消耗、崇拜成長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些都是人們和各國夢寐以求的事情。只要各國仍

然不放棄這種想法，就算綠科技實現了，地球還是負荷不了。

但若我們可以轉變這種想法、價值觀、行為、制度等，我們就可以改變科技所帶來的結果。社會科學不僅僅有關，而且還是至關重大。有三個可介入的領域如下：

1. 我們「發展」和「需要」的觀念：永續發展的定義（從 1987 年的布倫特蘭委員會而來）並沒有告訴我們何謂「發展」和「需要」。那什麼是發展？是揮霍的西方生活模式，還是快樂的自足生活？那什麼是需要？一個睡覺的人只需要 100 瓦特，而美國人平均要 10000 瓦特，瑞士人說只需要 2000 瓦特。那什麼又是適當呢？

這些問題都很難回答，但是不回答就是意味著「都可以」，包括了誇張的浪費資源也都可以。透過共同的努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等等可以想出更好的答案。

2. 人口：2050 年前會有 90-100 億的人口，可是這不是密度。密度被社會規範、經濟、父母家庭、政策等影響，這是未來社會科學可介入的地方。

3. 全球合作：我們的民族國家體系已經證明很不適合用來一起面對全球氣候變遷了。我們需要更好的全球制度。現在應該很嚴肅地應

用社會科學所擅長的制度設計來處理當前的危機。

社會學和社會科學對於改變人類發展模式可謂潛力無窮。可是除非我們把潛力轉變成真正的行動，否則只是枉然。我們最好馬上開始行動，因為科學已經預見若是再不行動，那麼就太遲了。那下一代會怎麼看我們？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會議 2 年之前，其實大家都有共識，都希望找出不同的發展模式，那就是另一種更平等、更把地球有限資源考慮進去的方案。■

註 1: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

註 2:Inter-Academy Panel, Statement on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http://www.interacademies.net/10878/19191.aspx>

註 3:The World Bank, Turn Down the Heat: http://climatechange.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Turn_Down_the_heat_Why_a_4_degree_centri-grade_warmer_world_must_be_avoided.pdf

註 4: Griggs D. et al., “Poli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people and planet”, Nature 495, pp. 305-307, 21 March 2013: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95/n7441/full/495305a.html>

> 氣候變遷 市場決定人類的命運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聯合國協商平台後的20多年後還持續增加時，世界各國的領導人越來越依賴市場來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可是另外有國家和社會運動反對這種作法。Herbert Docena這裡為我們帶來聯合國氣候暖化會議（2013年11月11-22日於Warsaw）的報導。



在 Warsaw 的運動遊行，在聯合國氣候變遷中心前。

已經連續第二年在聯合國暖化會議前夕有超級颱風出現了，這次是菲律賓首當其衝。對於在 Warsaw 開會的各國領袖而言，氣候暖化正在發生已經不容置疑了，並且那些排放最少溫室氣體的國，受到的災害卻最大。

此外，Haiyan 颱風和其他的超級颶風一樣，再次證明了這點，許多國的代表也都說聯合國協商平台徹底失敗了。雖然說協商會談持續進行，可是卻往很危

險的方向去。已開發國家比以往更團結一致地依賴市場機制去解決暖化問題。不過全球的社會運動可不會就此坐以待斃。

> 責任問題

Warsaw 會議其實不過就是另一場自從 1972 年以來在 Stockholm 討論全球生態危機的會議罷了。在 1992 年，多國政府

>>



與會者的非正式會晤，形成結論。

簽訂了公約要「穩定溫室氣體排放量以防止人類破壞氣候結構。」

可是這麼簡單清楚的任務執行起來卻很困難。原因就是這其實要改變的，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從電燈泡到一國的能源基礎結構，都要改變。有些人則堅持整個資本主義都要替換掉。而就像許多的改變一樣，這個改變也會讓某些人得利、某些人受害。

不過基礎的共識仍有，就是以開發國家必須帶領減少排放量。可是因為就算所有的已開發國家都做了，還是不夠，所以開發中國家也被要求加入，並且已開發國家要提供必要的科技協助。此外開發中國家也比較容易受到傷害，所以也必須協助其評估處理整個的影響。

這些則是越來越難達成，因為在這共識的檯面底下有更深層的衝突，包括不對等關係、分配、利益等等，也包括了人們對於行動的意義和和其他人的社會網絡，衝突像是什麼人該受到什麼樣

的對待等等問題。

開發中國家因為害怕要必須承受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責任，他們堅持富有的國家必須有所謂的道德責任，因為歷史上看來他們本來就是要負起比較大的責任。已開發國家需要受到強迫和限制，因為只是邀請或是引誘他們去做，那不太可行。

幾乎我所訪問過得的已開發國家代表都很生氣的拒絕這項要求，認為不可能要他們對全部的結果負責，特別是那些他們並不知道的部份。若他們現在會想做更多，那絕對只是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領導權力，而非感到罪惡。他們並不是那種可以懲罰的人。對他們能做的只有鼓勵。

> 發展問題

另一個複雜的問題是在這些努力的另外一面還要顧及如何永續再生，以及這是不是可以被當作目標的問題。這在經

>>

濟倒退的年代尤其重要。

在 70 年代許多團體批判資本主義，而聯合國、世界銀行、環保團體、資本家對於日漸增多對於環境運動風起雲湧的回應是「永續發展」，也就是解決環境問題和經濟發展可以並行。

這似乎已經變成的理所當然的常識，也是許多國家的目標了。其他組織和公民社會也同意這點。這所需要的，據他們的說法，是「全球環境治理」，帶來更多對於使用自然資源的管制。但是對於結果卻意見不一。

極端上而言，美國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管制：市場應該成為管制者。國家也只能被要求自願去管制。而且不能有所謂的由上而下的方式去執行。對於更高收益的承諾就是讓資本家可以綠化的方式，要他們投資乾淨的能源技術。

令一個極端則是歐盟的方式，一種比較像是社會民主的方法。國家要擔負啟更直接和主動的角色去限制氣體排放，然後協助投資乾淨能源產業等等。

而對資本家而言，主要的分歧在於有兩種資本家：傳統能源產業和綠能源產業。後者像是那些再生能源、碳交易、以及所有關於氣候變遷的商業機會。前者在美國比較容易有人支持，後者則是在歐盟找到盟友。

開發中國家總共有 130 國，歧異更大。不過他們大多同意重分配的正義必須是解決方式的核心所在，而國家的管制和懲罰（罰金、課稅），以及對市場的管制等也該採用。

可是內部仍有分歧。在更大的目標上，許多國家可以來支持永續發展，這也是北方所採行的，可是有些國家把焦點放在保護自然而非維持資本主義運作。

> 失敗的妥協

在協商的早期，新自由主義的方式主要由美國提出，但由於歐盟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反對而中止了。接下來的就是市場機制的妥協，在這之中已開發國家必須要限制其排放量少於 1990 年的數字。若是建立了更多的碳市場，那麼就

可以有更多的排放量額度。

在 1997 年的東京議定書中，這項共識似乎被美國和歐洲領導的已開發國家接受，因為這是市場機制和排放量管制的結合，但也因為他們都宣稱自己是無辜的：不像開方中國家所支持的方案去懲罰一樣，這種市場機制方案讓他們並不會受到懲罰。

許多人反對這種市場機制，並對低標準感到不滿，發展中國家會簽署的原因是因為這至少有約樹立，而且他們置身事外，還有可以透過市場得到科技協助。可是這對美國來說卻是太過投了，因為美國從中看到了對其自身利益的威脅，也看到了美國道德宣稱的矛盾：他們很罪惡，可是該負擔的責任卻不能多於其他國家。美國結果並不履行協議，許多國家也跟進。

在超過 10 年的實行之後，進展非常有限。許多國家打算減少排放量，可是只是因為經濟蕭條或是可以從碳市場上得到更低的買進價格。總體來說，排放量比起 90 年代高出了 60-70%，而且開發中國家並沒有得到什麼科技支持。

隨著協商的進行，其實過去幾年都在原地打轉，這次在 Warsaw 已經在寄望最有權力的巨賈可以把協商帶往新的方向上。「我們可以解決這個氣候問題，」菲律賓的代表這麼說。

> 邁向災害

協商平台一直重複以前被否決的事情。不像以前由美國領導的群體和歐盟想要各行其是，現在他們可能會結盟了。因為即使是歐盟也同意美國了，或是至少沒辦法提出 90 年代那種可行的替代方案了。

他們不斷的在協商平台上重複說：減少排放量的方式是要求國家去刺激市場，投資綠能源產業，並把自然資源定價。夠過這種碳市場的擴張與連結，開創「被賦權的環境」，並透國投資的政策和補助一起執行。這當然都是由上而下的作法。

這個任務如加拿大代表所說的，就是

>>

世界上所有國家所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氣候變遷有商業利潤」。從事相關生意的人透過「永續發展」的邏輯，認為他們必須受到禮遇，而非譴責，因為他們才是保護環境的人。透過市場就是透過他們去保障人類的未來。

可是這轉向了更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並看起來被反對派注意到了。儘管內部有分列，外部也有壓力，許多開發中國家仍然結盟，堅持國家而非市場必須確保排放量比須減少，資源和科技必須繼續重分配。

至少部份的不妥協可以被看成是左派和左傾政府，像是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厄瓜多等等的聲音。雖然這些聲音還是持續被邊緣化，協商平台上的這些國家似乎越來越可以阻止已開發國家的「碳市場連結全球」計畫。他們也是反對市場機制的主要行動者，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

「公民社會」也看起來相信了。大約 800 個 NGO 團體、貿易組織、社會運動代表的都站出來抗議這個市場機制的方向。這一切看起都像是在展現不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商人去決定。可是除非開發中國家和社會運動可以有真的影響力，可以影響決策者，明確訂出多少能

源可以產出，否則世界就是每年增加 4 度，Haiyan 會越來越多。比超級颱風更大的力量正在左右人類的命運。■

> 中國都市化的 戲劇性與破壞

by 周飛舟，北京大學，中國



農民的未來就被困在城市開發裡面。

每個村的家戶可以收到了幾塊農地，但總是有一片地是鄰近家庭的。而搬到公寓之後，住所和農地的距離就拉大了。村民總是要走上一、兩個小時的路才可以到那。所以後來地方政府也把一大片土地租給都市企業去種植經濟作物。在成都，土地的出租價格大概是每畝 800-1000 人民幣，相當於農民一年的作物收成價格。所以，當農民搬走以後，農地就便成了都市企業所接管，傳統家庭農業也變成了企業耕作模式。

公寓的生活也大大轉變了農民的生活模式。一方面農民沒有土地可以耕作了，沒辦法種菜和水果，或是養牲畜，像是養豬或養雞，租金是唯一的收入。另一方面，村民開始也要消費去負擔給處生活開銷。根據我們在成都的調查發現，農民在公寓的生活開銷平均提高了 30%。不只是生產關係，社

自古以來成都平原就是人口稠密的農業地區。在 2007 年的時候中央政府選擇了成都市作為「協調城鄉發展的先導地區」，這個計畫目標是要改變都市和鄉村的關係。成都的改革計畫對於其他地方有很大的示範作用，而且自 2009 年來也成為研究、學習、模仿的對象。其中計畫最主要的核心部份是鼓勵農民遷出分散在各地的鄉村，然後搬到政府蓋的大樓公寓裡面。每個公寓可以容納 100 到 500 戶家庭，這等同

於 3 個鄉村的規模。這些計畫都有配備基礎的設施，像是水、電、瓦斯、道路、垃圾場、健身設施等。而生活水準也和鄉村的平均看齊。所以這個計畫被地方政府稱為「新鄉村建設計畫」或是「城鄉發展平衡計畫」。可是，有些媒體稱之為「鄉村消失計畫」。

同時，農業發展也正在歷經轉型。從 1980 年代的去集體化改革以來，農業實行了「包產到戶」，而土地權不論是以使用和收入來衡量，都是平均分配給村民。

會關係也改變了。雖然長遠的影響現在還不清楚，可是要釐清整個圖像，還是必須放回到整個中國的快速都市化脈絡下來看。

中國的土地制度有兩種的產權：集體的農地產權和國有的都市產權。若城市需要農地作為都市發展建設，那麼就要馬上轉換產權，從集體到國有，這稱作「土地徵用」。只有地方政府有權徵用和賣土地。

地方政府也可以從「土地出讓金」從獲取高額利潤，也就是徵收農地轉賣給都市開發公司。2013年，整個中國的土地出讓金總額超過了4.12兆人民幣，佔了59%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同時，因為地方政府可以像都市開發課稅，這是1994年稅改後的政策，他們有很大的動機去爭取都市來開發農地。這個部份的稅和土地增值稅一起，就是土地財政的基礎。

除了利用非政府的資本作為都市開發的籌碼之外，地方政府也對公共基礎建設進行投資，而且這是超出其財務能力之外的事情。就法律而言，地方政府收取都市建設的租金是違法的。政府部門非但不可以獲取租金，而且也不能擔任保證人。然而在實務上地方政府總是利用政府財務資源去幫助國有企業，像是都市投資發展公司，都市交通公司，都市水利工程組織，土地保留中心等等。這些企業都是由地方的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所營運的，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取得銀行貸款，然後投資都市建設，並用政府所轉讓的國有營建土地向銀行抵押。幾乎所有的縣市都有這類的公司，也

稱作「地方融資平台」。這些金融平台可以得到抵押土地價格70%的金額，然後投入都市開發。一項中央政府的調查指出，地方政府在2013年6月為止共負債17.9兆人民幣，多數來自於融資平台。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都市擴張背後其實是有其土地和財政等制度的作用才得以可能。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透過徵收得到國有土地，然後投入都市開發和賣地獲取利潤。第二，在地方金融平台上，地方政府可以使用土地作為抵押然後像銀行貸款。土地和財務的雙重結合帶來了迅速的變化，所產生的都市繁榮景象和一般過去以工業化為基礎的都市化結果並不相同。

這個新的都市化關鍵在於獲取充足的國有土地向銀行貸款，然後開發。可是，中央政府為了保護耕地和食物安全，其控制了農業用地的總量，限制了地方政府的開發。成都改革體現了這兩種矛盾的力量：土地徵收的嚴格控管，以及基於都市化需要而大量索求土地。

在中國的農村，宅基地是不屬於耕地的。傳統上，農人總是擁有很大的宅基地。成都計畫讓農人搬到公寓裡面的動機之一是去「生產」更多的都市土地。農夫搬走後，宅基地變更為耕地。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可以使用這種耕地的增加來獲取都市化所需的用地。例如，若農人搬走之後，鄉村就可以變更100畝的宅基地為耕地，然後地方政府便挪用這100畝當作都市開發用地。而同時耕地的總量並沒有改變。

總地來說，農人居住的變化，就是從宅基地搬到密集

的公寓區塊，這也是中國農村都市化的源頭。若是農人不放棄其宅基地，政府就不能徵收耕地作為都市發展和向銀行貸款，而都市化的腳步就會減緩些。現今的成都計畫已經成為了許多其他地區的模範，都市擴張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快。■

> 土地掠奪與貪腐

by 張永宏，中山大學，廣東，中國



深圳抗議貪腐的標語。

在這波中國史無前例的都市化過程中，大片的土地被徵收去作為都市開發之用，農村集體產權的分配和管理於是成為了社會矛盾和衝突的焦點。在1990年代早期，東南沿海的都市化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來的迅速。而地方政府的治理也使得都市外圍鄉村的集體土地逐漸被分配給個體戶。但是在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制度沒有改變

的前提下，這些村民建立了「社區股份公司」，村民變成了土地持股者，然後可以獲得報償。

社區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地方政府為了要在不激烈改變人民公社時期所留下的權利結構前提之下進行都市化。公司董事是由村民互選而成，但是選舉結果很大的程度是被地方政府和鄉村派系所決定的。許多的農村幹部理所當然地變成了董事長，獨

>>

占了政治、經濟、社會的權力。而公司也由於介於在地方政府和農村之間，遂變成了政府的工具，用來解決都市化過程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舉例而言，公司不但管理整個集體產權，也代表政府去實施基礎建設、公共安全、福利、環保的政策。

雖然鄉村委員會和公司都是所謂的草根自發性組織，但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派系的影響凌駕了村民自主的原則。結果就是造成公司董事長和地方政府的合謀，並掠取了更多的土地。

最近幾年來由於土地不斷的增值，董事長就可以藉由賣土地而大賺一筆。這個現象導致了許多抗議與不滿。根據我研究單位的研究指出，從2012年的春天開始，也就是從烏坎事件之後，幾乎廣州和深圳（廣東縣）的村莊都爆發激烈的集體抗議。村民最後贏得了2013年的反對公司領導的戰役，而新選出的董事會簽了新的集體產權租約，帶來了1千

6百萬（1億人民幣）的進帳。

和勞資爭議不同的是，反對土地徵收的抗爭和貪腐可以為村民的個人經濟帶來保障，也可以挑戰地方政府的統治正當性。由於傳統的家庭和鄰里的關係以及世代都住在同一個村，土地抗爭一直是長期的抗戰，並且為社會和政權的穩定帶來威脅。此外，若不妥善處理抗爭，日後的土地分配和都市發展會無法展開，所以地方政府無不開始嚴格調查和懲處貪污的按鍵。在廣州市，幾乎有4分之1的村莊幹部因此被懲處。

在中國威權政府的統治下，程序規則（如村莊選舉和訴訟）是一種有解決抗議事件的有效方式。在烏坎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面對這個強烈的抗爭，採取的是進行法律調查貪污，並重新舉辦選舉。同時，在許多村莊裡面，選舉非但沒有辦法保障村民的產權，反而成為了幹部和派系中飽私囊、貪污腐敗的手段。所

以村民對選舉大多沒啥好感，不認為選舉是權利，反而看成是貪腐的巧門。田野中的受訪者告訴我們，只要有人贏得選舉，那結果就是權力讓人腐敗。

現有的農村治理系統是奠基在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上，這嚴重侵蝕了鄉村的自主性。照理來說，政府在都市化過程中應該是滿足人民需求和保障基本權利，使其轉型為都市居民。現今，國家和農村的互動改變得很快，雙方都在找尋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可是即使嘗試再多的方法，若是現有土地產權制度沒有改變，村民永遠會是都市化的犧牲品。■

> 疏濬抗議

長江三峽大壩

by 應星，中國法政大學，北京，中國



雲陽縣的運動者敘述何克昌事件。應星攝影。

當代中國社會中，一旦官民發生衝突，主要有四種方式解決：階級行動、請願、抗爭、暴動。其中以請願和抗爭最為常見。以下我將以三峽大壩工場為例，討論那些被這工程迫

遷的人民階級行動的法律訴訟：「何克昌案」。

總共 846,200 人被迫遷移到長江保留地區，其中的 361,500 人是從鄉村來的。自 1997 年來從重慶雲陽縣來的農民已經發動過上訪請願了，而其中的

>>

代表何克昌總共歷經過了4個階段。

1997年10月到2000年3月是從萬人上訪轉變到到集體請願。在1997年7月，雲陽縣長開始了遷移居民的試驗，而當地方政府公佈補償的低標準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彈。當地農民開始寫信給中央政府表達其意見。

上訪總共由10000人連署，這數字讓重慶的黨政高層和中央政府專門指派了一個工作小組去解決問題。可是政府不認為有任何的補償不足，有的只是居民的誤解以及越級上報問題的不當行為。何克昌和其他代表很不滿意這個結論，從1998到2000年，他們寫了那麼多信到北京，親自去了2次，到重慶也很多次，結果居然換不到任何答案。

上訪和地方抗議衝的升高：2000年3月到2001年3月。在1999年5月，國家委員會決定要改變三峽大壩的遷居政策，農民

不能在附近被安置，而必須遠走他鄉。這引起了另外一波雲陽縣的抗議浪潮。何克昌是領導者，整個抗議採用了幾個策略：和地方政府面對面衝突和爭論，改善組織，彼此熟識和傳播資訊，增加請願的強度，和國外媒體接觸。

囚禁入監的折磨：2001年3月到2004年3月。在2001年3月，何克昌和其他兩個代表再次到北京上訪。重慶政府在北京逮捕了這三人。後來，雲陽的人民法庭宣告迫遷調查組織挑戰政府的政策，並把何克昌處以3年徒刑，其他2人則是2年徒刑。罪名是破壞社會和諧。這是第一次三峽大壩的請願者被送進大牢，也引來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永無止盡的抗爭：2004年3月至今：2004年3月11日，何克昌被釋放，雖然他遭到刑求

，雙腿被打斷，手也被打到變形了，甚至財產全

部在2002年8月充公，其精神仍未凋謝。釋放之後，他拒絕和地方政府合作，並持續收集相關資訊。他已經獻身了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戰役之中。

我們在何克昌案中看到的是一種抗議策略的務實主義，從法律和非法律的方式中著手，甚至是結合兩者。從迫遷居民角度而言，法治和人治的差別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策略的務實性，可不可以達成目的是首要考量。居民訴諸法律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司法，發動上訪也不是因為相信那些官員。他們採用這兩種策略作為加速達到目標的方式，這其實和政府也採用這兩種作為有效率的統治方式，背後的考量點是一樣的。■

> Jan Szczepanski

搭起橋樑

by Adam Müller, Kamil Lipin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rzysztof Guban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Jan Szczepański (1913-2004) 是波蘭社會學家，也是 ISA 的會長 (1966-1970)。他也是第一個東歐擔任此職位的人，其著作頗豐，專欄論述也很受歡迎，被廣泛討論。他更投入政治，是議會成員 (1957-61, 1972-85)，也是國家委員會的成員 (1977-82)。作為 ISA 會長，其面臨了兩大挑戰，第一是東方和西方，以及和全球南方的對話。結果有一屆世界大會在保加利亞的 Varna 舉行；第二，根據其日記，他對於繁複的文書行政流程做出簡化組織制度的改革。



| Jan Szczepański參加宴會。

波蘭的政治體制很特殊，像是 Vinicius Narojek 所說的，就是國家有限的正當性。一方面，這個政府在民意上有很高的基礎，特別是在初期蘇聯時代。另一方

面，政府也被視為必要之惡，所以可以和蘇聯保持一定距離。其中一個就是其願意繞過蘇聯的中央教條去建立自己的制度。「人民民主」在許多危機時候 (1956, 1970, 1980) 就

>>

顯現出各式各樣的面貌。

波蘭的知識階級對於這個有很不同的態度：從完全反對到完全支持都有。許多人採取了困難且道德上不安的位置，這也是我們看到 Jan Szczepanski 的身影的地方，加入了形成共產黨內新派別的組織，同時也反對共產黨的扭曲統治。因此，在極權和知識分子之間建造起了一個橋樑，讓知識分子有空間可以發聲，保持相對自主性。我們也看到知識階級在後來的團結工連運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共產國家中，大學有社會系是相當少見的。波蘭也因為如此造就出了許多傑出有名的社會學家，像是 Jan Szczepanski、Maria Ossowska、Stanisław Ossowski、Zygmunt Bauman、Maria Hirszowicz 和 Stefan Nowak。

Jan Szczepanski 擔任政府要職，給予教育和社會政策建議，這讓他可以有機會實踐公共社會學。他不把自己當作出世的學者，而是入世的參與各種社會

的討論與改革。也因為他的政治影響力，波蘭許多科學家可以出國開會。他也努力保留政府文件，讓學者可以做研究。他也參加抗爭，這在共產時代是很少見且需要大勇氣的。例如，1954 年他加入了 34 位知識分子的連署抗議言論審查，不過在第一波的逮捕之後退出了。

他也是一位記者和專欄作家，其政治職位給予了某種程度批判政府的可能性。其公共的論述也影響了波蘭一整世代的人。在那個言論自由仍然不被允許的年代，他把社會學的概念帶入了公共領域。但是在他過世後的 10 年的今天，他已經被人們淡忘。儘管文章很多，可是沒有留下任何理論和學術傳統。他的百歲冥誕，波蘭社會學會和研究院舉辦了研討會，但是年輕學生沒有太大共鳴。

Jan Szczepanski 的一生一直為了增進人類福祉而奮鬥，也就是想達成「人性社會主義」的理想。其行動彰顯了公共社會學在

非民主體制下仍然有努力的空間。不過這卻付出了代價：深陷權力遊戲之中，並做出壞的妥協。

> 波蘭高等教育的 新自由主義化

by Dariusz Jemielniak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ozminski University,
Warsaw, 波蘭



學生和教授參加New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NOU)的會議，這是一個NGO，由博士生成立，研究波蘭學術體制。NOU授權圖片。

這不是第一次當代波蘭的學術界在全球對話上發聲了。在2.4期裡面，波蘭社會學實驗室的成員就指出了波蘭大學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問題。(1) 過去七年來，波蘭的高教系統歷經了重大的轉變，波蘭的學術界被要求要有世界級的水準。這個目標看起來很崇高，也很正當，可是事實上，改革的結果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造成更差的環境。

為了理解波蘭學術的慘況，讓我描述一下這個

結構性的轉型帶來什麼樣的問題。現在是個好時機，因為波蘭有了新的教育部長：Lena Kolarska-Bobiska，是一位社會學教授，也是前歐洲議會的議員。她卻堅持要蕭規曹隨。

學術的資源大概是GDP的0.4%。這讓波蘭成為了歐洲教育經費比例最低的國家。我們也應該強調，即使波蘭人可以使用歐洲的研究資金，可是只有很少數的人去申請。最近的改變意味著更多的公

>>

共資源流到了新的分配者手上，像是國家科學中心(NCN)，而不是被送到需要的大學手中。然而，在國家的層次上，這個分配系統堆動獎勵和專業制度，卻強化了區域資源的不平等。Mazovia省(首都Warsaw的所在)拿到了不成比例多的資源。

這個不平等也是由對於博士經費的競爭所導致。20%的總體研究計畫評鑑是取決於計畫執行者的成就，這也讓那些研究中心的大教授得利許多。這個資源競爭在過去20年來成長了15倍的博士候選人。同時，達到學位的人數只有2倍成長。(2)這是因為只有很少部份的博士生拿到獎學金，而研究和教學津貼則被取消，研究生只能落入一種被遺棄的學術階級裡面。(3)

這個過程和波蘭的人口變化有和大的關係。上大學的人口從社會主義轉型後的9.8%成長到現在的50%，簡直就是快要全世界最高了。而同時公共的資源只限制在學生人數，撥出一小部份當作研究。當波蘭現在面臨人口危機時，也就是少子化，大學也面臨了財務問題，學校招生有困難。所以近期要把學校Białystok的哲學系(在波蘭的東北)然後開認知科學系的事件，激起了很大的辯論。整個波蘭的公共學校哲學系所都面臨到了相同的處境。其他人文科系也是。這些系

都變成了次要的主修科目。

而影響到的還包括了研究品質。例如科學部引入了一種研究評量制度，把期刊的排序看成很重要，可是這些期刊排序是私人公司所排名的，也就是從Thomson Reuters的「期刊引用報告」裡面來的。其使這個排名就算合理好了，波蘭的政策也扭曲了學術的意義，也就是把那些在名單之外的期刊視為是不透明的，也漏掉了很多好期刊，粗糙地把生物和社會學等差很多的學科擺在一起比較。其他的發表也被視為是次等的，而名單內的也不加以比較，像是在牛津出版社就被放在和其他出版社同一等級。

許多的改革，包括了學術評鑑的鐵籠，這些都是由政府的掌控所導致了，而不是為了教育和學術品質。例如，所有的教授都要準備詳信的課程大綱，以便評量教學成效。這個官僚的舉動是在監控教授的行為，不是在幫助教學品質的提昇。

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造成了獨尊應用性研究，貶低那些無法立即帶來效益的研究(像是哲學和社會學)。可是這個概念並不一致。例如，在1989年之後設立的私立的波蘭大學沒有辦法得到國家補助，即使品質比公立大學還要好。所有這些都表示出改

革並沒有改善高等教育，只有負面效果而已。

波蘭學術界的處境岌岌可危，但我想不是特例。全世界的大學都面臨了一樣的狀況。除非學術界和大學有一個具體和建設性的改革方案，可以改革高等教育，讓政府接受，避免錯誤結果，否則只會每下愈況。可是事實上，我們很可能早已錯失行動的良機了。■

1 Mierzejewski M., Mikołajewska K., Rozenbaum J., "One or Many Sociologies? A Polish Dialogue," *Global Dialogue* 2:4, May 2012.

2 Michalak D., "Studia doktoranckie w Polsce – łatwo zacząć, trudniej skończyć," *March* 2013: <http://noweotwaracie.wordpress.com/2013/03/11/studia-doktoranckie-w-polsce-latwo-zaczac-trudniej-skonczyc/>

3 Editorial: "The disposable academic," *The Economist*,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723223>

> 關心高等教育改革的公開信

Presented to the Pol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the Critical Section,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Cracow, 波蘭

2013年9月第15屆的波蘭社會學大會在Szczecin舉行。而經過了連續幾場的學生辯論，公共社會學實驗室屬名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高等教育必須做出改革。這封信再大會中宣讀，並接收到了廣大的迴響。而2014年1月的一場名為「當代波蘭社會學」的會議中，卻只有一名學生代表接受邀請參與。這裡我們發表這封公開信，呼籲重視學生的問題和提出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針。由 Krzysztof Guba ski 執筆。



在Cracow舉辦的學生會議，討論高等教育的堪憂前景。

親愛的各位：

我們是一群關心學術環境議題的學生。我們雖然並不代表所有的社會學學生，但是作為一個來自 University of Warsaw

和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的學生組織，我們想要公開我們之前對於高等教育議題所作的辯論，因此，也藉這個機會顯示學生並不如外界所說的那樣冷漠。我們已經舉辦了多場的會

>>

議討論相關議題，也吸引了許多公眾的參與。這表示了學生能夠替自己發聲！

我們發現到了一個現象：對於高教改革的辯論長期以來忽略了學者的聲音。教育部作為仲裁者，卻拒絕學者的投票權，把其視為是保守的一群，反對現代化的進步改革。此外，對於政府改革的抗拒卻被視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同時，那些改革的支持者卻說這是為了學生的利益，為了解放學生。可是學生的利益卻仍然如空中樓閣、真正的聲音從來沒被聽見。學生被看成是冷漠的一群人，沒有主體性，沒有說出自己主張的能力。

對於改革的討論著重在不可調解的兩種對立邏輯上：市場 VS 學術。這種方式讓學者產生了兩種反抗的模式。第一，學者和科學家把支持市場邏輯的論述定位是接受教育部的改革方案，是由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第二，學者把保守的邏輯，也就是堅持理想社群的主張定位是精英主義和制度自主。可是自主在這

裡代表著什麼呢？這裡，自主性是指市場和國家的力量所結構出的場域。可是這是不可行的。如此的論述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把學者視為封建的反抗力量。

為了要取代這兩種控訴和反控訴，也就是所謂的「教育錯誤」，我們提供了一種雙向的公共溝對話，去討論當代大學的需要和特徵。我們也提出了一種教育方案，把學生考慮進去，看成是第一公眾，以其把社會學知識直接轉譯給公眾。和政府的改革邏輯相反的是，政府是一種商業顧客模式，而我們的是堅持學者有其自主性，可以決定專業社會化的方向。我們會希望老師可以使用各種社會學知識，而不是故步自封。舉例而言，知識的共同生產，透過共同的鬥爭，訴求參與的平等，進而形塑波蘭和歐洲的高等教育討論。

我們相信大學生和研究生，也就是改革所訴求的受益者，有足夠的潛力去挑戰機會主義的詮釋：封建大學的反動。目前為止，這樣的潛力尚未成

形，我們繼續努力讓學生加入公共討論。而問題之一一是學生沒有足夠的改革資訊和知識，此外，也包括了老師沒有給予協助和鼓勵。若把公共辯論讓位給其他人，那輸的一方會是老師和學生自己。當學術輸了，那麼影響力也沒了，學生也不再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改變，那整體社會只會更加冷漠。

現在的學術環境原子化只會強化了教育部的霸權地位，所以，我們呼籲要老師、學生、研究生等全體聯合起來。我們相信，波蘭社會學會可以扮演社會催化劑的角色，讓社會學負起責任去結合更廣大的參與，這也關係到社會學的命運。這封公開信是要邀請各界來對話，也倡議合作。在此，我們要呼籲，這個社會的主人要看見我們的能動性，一起為共同的美好世界而奮鬥。



> 土耳其編輯團隊

我們從全球對話2.4期開始翻譯。一開始在尋找團隊成員的時候有點挫折，但是現在我們的團隊相當的穩固了。我們其實分散在土耳其各個不同的城市，儘管地理上分開來，但是透過數位媒體，我們的溝通相當順暢。以上是簡單的介紹這個團隊，接下來我們介紹各位成員。■



Dr. Aytül Kasapo lu 是 Ankara University 社會系的教授，主要興趣在災難社會學、健康與疾病、研究方法、社會問題。



Dr. Nilay Çabuk Kaya 是 Ankara University 社會系的教授，主要興趣是性別與社會發展。



Dr. Günnur Ertong 於 2003 年從 Bilkent 大學畢業，然後從 Ankara 大學於 2005 年拿到碩士學位，都是經濟系。2011 年從 Ankara 大學取得社會學士，論文題目是 Trust in the Health System and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Dr. Ertong 之前在土耳其的健康部工作 (2007 to 2012)，現在則是在土耳其科學與科技研究委員會的社會統計研究部工作，其研究興趣包括了健康系統的信任信任，對健康工作者的暴力，以及暴露風險下的小孩。



Dr. Zuhâl Yonca Odaba ı 從 Ankara University 於 2000 畢業，然後在 the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拿到碩士，並於 2009 年於 Ankara University 取得博士，論文是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Gender。她現在是 Ataturk 大學的副教授，興趣在疾病與健康、災難社會學、性別。



Gizem Güner 從 Hacettepe University 於 2013 年畢業，準備攻讀碩士，並且對於暴力和階級、族群有興趣。她從 2013 年 1 月開始加入團隊，現在於一間私人企業當審計員。



Zeynep Baykal 從 İstanbul' s Bilgi University 的政治系畢業，然後在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拿到社會學碩士學位。其論文是 Construction of Armenian Identi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Ye ilköy，並且獲得土耳其社會科學會的論文獎項。現在她在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攻讀社會學博士，興趣是族群、認同、文化、藝術社會學。她也對戲劇批評和戲劇有所研究，並持續在 İstanbul University 的戲劇系修課，她從 2012 年 10 月開始加入土耳其全球對話團隊。